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文丛

刘平〔美〕裴宜理 主编

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

〔荷〕田海 著

刘平 王蕊 译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文丛

刘平 [美] 裴宜理 主编

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

(荷) 田海 著

刘平 王蕊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 / (荷) 田海著; 刘平, 王蕊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文丛)

ISBN 978-7-100-14004-1

I. ①中… II. ①田… ②刘… ③王… III. ①白莲教—研究—中国 IV. ①B9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2987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文丛

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

(荷) 田海 著

刘平 王蕊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004-1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5 1/2

定价: 66.00元

Barend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Koninklijke Brill, 1992

<http://www.brillchina.cn>

© 1992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incorporates the imprints Brill, Hotei Publishing, IDC Publishers, an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根据博睿学术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出

献给我的父母
感谢他们的支持

总序：近代秘密社会简论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如果不能认真看待秘密社会的作用，人们将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近代史。尽管中国秘密社会早在进入近代的几个世纪之前业已产生，但是这些结社的内在吸引力、活动范围与政治影响的急剧扩张，却是与鸦片战争带来的剧烈变动前后相接、如影随形的。^①

在 19 世纪晚期、20 世纪前期发生的剧烈变动中，势力强大的帮会，诸如三合会、青帮、哥老会等，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生命与生计都受到威胁的人群来说。^② 秘密社会为其成员——大多是贫穷的单身男人——所提供的保护、互助、团体意识以及兄弟义气，极大地促进了其自身的壮大。随着会员数量的急剧增长，秘密社会的政治意义也开始迅速增大。

秘密会党成员入会时，必须歃血盟誓，绝对效忠其首领，并随时听从“龙头”老大的调遣，参与更为广泛的集体行动。崛起于广西和广东偏远山区的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够蔓延到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联合三合会以及上海小刀会这类三合会分支有着密切的关系。^③

① Frederic E.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②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一般而言，秘密社会由“秘密会党”（或秘密帮会）与“秘密宗教”两个部分组成。英文 *secret society* 一词，一般译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但更多的是指秘密会党，如三合会、哥老会之类（西人最先是从小南洋开始接触华人秘密会党的）；19 世纪末，青帮崛起，与会党合称秘密帮会；青帮系“清帮”之讹音，而洪帮（哥老会）演为“红帮”，合称青红帮。——译者

③ 参见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

从萍浏醴起义到武昌兵变，辛亥革命之推进，得益于孙中山和黄兴竭尽全力地争取海外洪门以及国内秘密会党的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力。^①早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在发动产业工人时也曾得到秘密会党的帮助。李立三借助安源煤矿的红帮与上海工厂中的青帮势力以发动工人运动的策略，最终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②

然而，秘密社会并不总是站在起义和革命的一边。非法活动——鸦片走私、掌控妓院赌馆和收取保护费——是支撑秘密会党庞大网络的经济命脉。而这些犯罪活动的猖獗，与政府人员——从当地警察到政府高官——的纵容和腐败有关。上海青帮大亨和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而已。^③

在帝制时代和民国时期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秘密社会问题，构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共产党政权的主要挑战。虽然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为反政府起义来源的秘密社会的政治威胁，但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造反派工人就曾模仿秘密会党成员的服饰、语言和行为。^④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秘密社会绝不是单单存在于中国的问题。在一些国家，当代秘密社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仍旧让执法当局头疼，而美国的黑手党和日本的山口组仅仅是其中的两个著名事例而已。^⑤

① 孫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

②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③ Brian G.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④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⑤ Pino Arlacchi, *Mafia Business: The Mafia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宮崎学『ヤクザと日本：近代の無頼』，東京：筑摩書房，2008年。

可是，秘密社会在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变革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例子，人们很难在中国之外找到。

基于秘密社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学术界理所当然地会对秘密社会的研究给予极大的关注。商务印书馆即将面世的这套丛书，收录了目前最具影响的部分中外文相关学术著作，旨在探究中国秘密社会的起源、复杂性、延续性和间断性等问题。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激发青年一代学者就秘密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问题，给出更加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译者前言

中国历史上，“白莲教”赫赫有名——自“白莲教”一词出现以来，“白莲教”就是与“邪教”、“异端”、“叛乱”画等号的，因而不时造成其声名扭曲而远播。由于传统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偏见，明教（转入地下的摩尼教）、白莲宗（净土宗异端）等教派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后，就开始了“被妖魔化”的历程，被贴上“吃菜事魔”、“魔教”、“白莲菜”、“邪教”、“反动会道门”等标签或罪名。

在遥远的西方，一位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ter Haar）——独辟蹊径，专注于“白莲教”研究，对这一国人司空见惯的名词或概念提出质疑：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白莲教”这一教派吗？白莲教究竟是一个虚拟的通称，还是一个实在的个体，抑或只是一个施加迫害的标签？^①

^① Barend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初版于荷兰博睿出版社（1992），再版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该书名直译为《中国宗教史上的白莲教》，经与出版方商定，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

田海现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莱顿汉学》编辑，《远东学报》与《东亚历史》编辑部成员。1984年，田海于莱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他在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1994—2000年，田海任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社会与经济史C3教授。他对中国文化史与宗教史有着浓厚兴趣，还广泛研究种族认同、暴力与恐慌、巫术、社会组织等问题。他认为宗教维度是中国传统生活的中心，而传统文化与文化模式至今仍然产生影响。田海目前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四部：第一部即这本《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二部是 *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 E. J. Brill, 1998；中译本名为《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部是 *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Leiden: E. J. Brill, 2006；中译本名为《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由中西书局于2017年出版）；第四部是 *Practicing Scripture: A Lay Buddhist Mov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译本名为《诵经：中华帝国晚期的世俗佛教运动》，正在翻译中）。

为了清晰地理解田海的观点与贡献，我们不妨立足于学术史发展脉络，梳理以杨讷为代表的白莲教存在论、马西沙的白莲教阶段论与田海的白莲教否定论，并做出相应评价。

一、杨讷为代表的白莲教存在论

传统观点认定“白莲教”是一个统一的教派或是一个通称，民国时期以陶成章、向达、陶希圣等人代表，1949年后以李世瑜、杨讷等人代表。^①在海外学者中，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吉冈义丰与野口铁郎等人也基本上持论如此。^②虽然这些学者在具体表述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总体上认可中国宗教史上存在“白莲教（派）”或者“白莲教系统”。^③

① 关于白莲教的研究论著，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1908）（现据《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向觉明（向达）：《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1934年第2卷第6号；陶希圣：《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明代弥勒白莲教及其他“妖贼”》，分别载《食货》1935年第1卷第4期、第9期。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陈诗启、郑全备著《试论清代中叶白莲教大起义》，方庆瑛著《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李世瑜著《青帮、天地会、白莲教》与《白莲教正义》，以及夏家骏著《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蒋维明著《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喻松青著《明清白莲教研究》，王兆祥著《白莲教探奥》，杨讷著《元代白莲教研究》等。港台地区研究主要有李守孔：《明代白莲教考略》，载包遵彭编：《明代宗教》，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庄吉发：《清代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及其支派》，《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80年第8期。

② Daniel L. Overm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译本：（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译本：（美）韩书瑞著，陈仲丹译：《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日）吉冈义丰：《现代中国之诸宗教——民众宗教之系谱》，佼成出版社，1974年）；（日）野口铁郎：《明代白莲教史之研究》，雄山阁，1986年。关于白莲教研究的英文博士论文有：Yung-deh Richard Chu,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the White Lotus Sect in Chines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Cecily M. McCaffrey, “Living through Rebellion: A Local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Uprising in Hubei,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3。

③ 国内主流辞典对“白莲教”的解释基本上认定白莲教是一个统一教派，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8页；任继愈主编：《佛

在诸多研究著作中，杨讷的《元代白莲教研究》可谓传统观点的代表，最具影响。总体上看，杨讷认为“白莲教”是事实上存在的宗教教派，“白莲宗”与“白莲教”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白莲宗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新的佛教宗派。而“白莲教”与“白莲社”有联系也有区别。茅子元所创白莲宗与之前的白莲社一样，崇奉阿弥陀佛，以往生净土为修行宗旨，故白莲社与白莲宗—白莲教存在信仰上的共同关系，但两者之间没有组织关系。白莲教确立了较为严密的师徒关系和宗门关系，以“普觉妙道”四字为“定名之宗”，确立分散在各地的信徒之间的宗门关系。^①并说茅子元创建的“白莲教”可以称作“白莲社”，但在茅子元之前建立的“白莲社”却不能称作“白莲教”。^②他考虑了“白莲教”出现之前的情况，却没有分析“白莲教”出现后，依然有诸多并未遭到朝廷迫害的“白莲净土”信仰者存在于明清社会之中（田海称之为“白莲传统”）。

明清朝廷与佛教正统以及后来研究白莲教的学者把元朝及其后来出现的各种以“白莲”为名号的结社均视为白莲教，杨讷归纳说：“元代白莲教（白莲宗）情况很复杂，其称谓也不仅是莲宗和莲教，还称白莲社（《元史》记至大元年‘禁白莲社’）、白莲会（杜万一‘指白莲会为名作乱’），指的都是以白莲为名的宗教社会。我们还在《大明律》中看到，明初仍称白莲教为白莲社。白莲教（宗）的派别、信仰，并不以称宗称教或称社称会标志出来。”^③尽管如此，我们从其论述及相关史料中，看到的是白莲宗有“莲教”之自称，并无“白莲教”之自称；自称“莲教”自然没有贬义，后来指称的“白莲教”则

（接上页）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5—426页；《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修订本，第2364页。

①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25页。按：《元代白莲教研究》系杨氏相关研究之集成。实际上，杨氏很早以前就发表有影响的《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以及出版《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5）、《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1989）等。

②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③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等同于“邪教”。两者不是一回事。

喻松青继承杨讷的元代白莲教研究，对明清时期的白莲教加以探讨，她认为明清“白莲教”既是一个单独的教派，也不断融合其他教派，因此是一个通称。她认为，“明代的‘邪教’，除白莲教外，还有其他教派，尤其是万历以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不过总的说来，各教派的信仰、组织等情况是大同小异的，原来差异较大的，也逐渐趋归一致，互相混同。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邪教’可以用白莲教总其名”^①。凡为“教”或“教派”者，必有创教源流、教主、教义等基本要素，喻氏语焉不详，一蹴而就于“白莲教”，乃习惯使然，与前述杨讷的“白莲教（宗）的派别、信仰，并不以称宗称教或称社称会标志出来”观点一致。

而且，她在行文中对“白莲教”、“白莲菜”、“白莲社”、“白莲会”等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是不加区别的，对于有关名号是自称还是他称？是标签还是实质性结社？含混不清。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袭“朝廷”思维，对于诸多史料未加以仔细辨别。

与杨讷和喻松青不同，连立昌认为南宋时期茅子元建立的是“白莲宗”。白莲宗在元代中期发生分化，下层白莲道人因不满社会现实，在教义中引进了弥勒救世思想。在元末，这种变化了的白莲宗（会）与元以前的佛教异端弥勒会（含香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白莲教，属于“元末衰世的产物”^②。

白莲教形成之后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连立昌的表述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指出明初不断有白莲教起义，如彭玉琳、唐赛儿等；^③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明初高压政策下，民间秘密教门中人忌讳白莲教这一称呼，没有人自称为白莲教。这其中既有本身就不是白

①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12页。

② 连立昌、秦宝琦：《元明教门》，载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③ 连立昌、秦宝琦：《元明教门》，载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85页。

莲教的唐赛儿，也有本身就是白莲教的张普祥。所以明代的“白莲教”仅仅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以此命名的教门了。进而，连氏将新出现的众多教名进行了分类，认为除了避讳之外，部分新的教名在教义上有了新发展，其实就是出现了新的教派。

关于清代的情况，学界多因循传统说法，尤其是1981年出版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将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认定为白莲教起义。^①20世纪90年代，从马西沙开始（见下），对“白莲教”发动这场起义的说法加以质疑，后来有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认为系清代新兴教派所发动，如秦宝琦赞同马西沙的观点，认为系由“混元教与收元教所发动”^②，曹新宇则认为系由收元教发动，与白莲教无关。^③他们没有从宏观上否定白莲教，只是在具体个案上展开研究，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宗教研究的一种趋势。

二、马西沙的白莲教阶段论

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西沙对白莲教、元末农民起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④稍后他对以杨讷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进一步提出批评，其观点主要体现在《白莲教辩证》一文：（1）白莲教是弥陀净土宗与天台宗混合的世俗化教派。（2）元末农民起义应该称为香会起义（或香军起义）。（3）明清民间宗教不应统称为白莲教。我们可以把马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1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编例第1页。按：清廷称呼此次起事者为“教匪”、“邪匪”。

② 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1卷《清前期秘密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③ 曹新宇等：《清代教门》，载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3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④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4年修订版上下册。

西沙的观点归纳为“白莲教”阶段论，也就是说，历史上确有名为白莲教的教派存在（弥陀净土宗与天台宗混合的世俗化教派），主要存在于元代前中期，一般认为的元末白莲教起义实为香会起义，要分清白莲教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①

关于白莲教，马西沙认为：“茅子元创白莲菜的时代，尚不完全具备‘邪教’特点和组织体系，仅为一异端的净业结社组织。只是到了元代，才形成分化，一部分白莲道人发展了茅子元宗教理论中的异端成分，并把组织体系完全独立化，逐渐形成了白莲教。”^②进入明清时代，“白莲教”已不复存在。换言之，真正的白莲教只存在于元代。这一观点与连立昌很接近，区别在于连立昌提出白莲教形成于元末。

马西沙与杨讷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白莲教与弥勒净土信仰关系的认识上，由这一认识上的差异又引出两人关于元末农民起义是白莲教起义还是香会起义的争论。

在分析白莲教与弥勒净土信仰关系时，杨讷指出，“在元代渗入白莲教并且终于使它大为改观的是弥勒净土信仰；更准确地说，是‘弥勒下生’故事”^③。他认为：“由于弥勒、弥陀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一部分白莲教徒可以毫不费力地接过‘弥勒下生’传说来为己用。‘弥勒下生’只是宗教幻想，没有确定的社会内容，它可以被利用于不同目的。”^④从逻辑上来说，杨讷之论可以成立，但从元末实际情况来说，崇奉弥陀净土的白莲教为何不以弥陀为令箭，而以弥勒净土的“弥勒下生”、明教的“明王出世”为号召，必须以证据说明，否则属于想当然。

至于马西沙所说元末农民起义是香会主导的观点，我们从佛教史、净土宗演变的情况来看，弥勒和弥陀是佛教框架内两种不同的信

① 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② 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③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④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1—133、134页。

仰，不能随便改“宗”；所谓元末“白莲教起义”并没有以“白莲宗”的弥陀为号召，而是以明王、弥勒为号召；弥勒如何渗入弥陀，让元末“白莲宗”忽然改观，至今仍然是一个谜。马西沙无法解开这个谜，只好从所谓的“香会”寻求突破，不幸的是，“作者证‘白莲教’与其他民间宗教之异同，其基本依据还是在白莲教的规定性上”，“作者所以要否认白莲教曾受到其他民间宗教特别是摩尼教、弥勒信仰的影响，是因为一旦承认，那么元明清时代打着‘弥勒下生’旗号、烧香聚众者就不能在弥勒信仰与白莲教中被区分开了，作者也就无从提出创见”。^①（译者按：即提出“香会”、“香军起义”用以取代“白莲教”、“红巾军起义”的观点。）

正是从弥勒和弥陀不能随便改“宗”的立场出发，马西沙认为，弥陀净土信仰是白莲教的根本信仰，凡是信仰弥勒而不是弥陀的教派均不能视为白莲教：“明中叶仍有‘白莲教’活动，但这些‘白莲教’并不信仰弥陀净土思想，大都以弥勒下生为号召，这种‘白莲教’仅有白莲教之名，而无白莲教之实了。本质是弥勒教的信仰了。”他列举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李福达“白莲教案”为例，“这种‘白莲教’不但与宋茅子元所倡白莲教迥然不同，与元代普度的白莲教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了。明代诸多所谓‘白莲教’大抵应作如是观”^②。

关于白莲教的最终归宿，马西沙认为白莲教在明清时代已经消失，“人们再也找不到一支真正以弥陀西方净土为信仰，以家庭寺院为组织，以普、觉、妙、道为道号的白莲教了。宋、元时代的白莲教，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已经融进了波澜壮阔的民间宗教运动的大潮之中，已不具备主宰的地位了”。当然，部分民间教派受到白莲教的影响，比如以“普”为号。^③那么，《明史》与《明实录》等官书记

① 张传勇：《白莲教的名实之辨——读〈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② 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③ 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载的明前期出现的大量白莲教起义及其以后出现的无时不在的白莲教案件又该如何对待呢？官府、文人与百姓可不管你是弥勒还是弥陀的啊！

至于元末农民起义是否为白莲教起义，杨讷依据《元史》指出，“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颍上之寇，始结白莲”，这两条记载无论是“白莲会”还是“白莲”，指的都是白莲教。^①而马西沙认为元末农民起义是香军起义，当时虽然有一大批白莲教徒参加起义，甚至成为骨干成员，但是白莲教并非起义的主力 and 倡导者，其弥陀信仰在这次起义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这次起义的首倡者是香会，即弥勒教会和摩尼教的混合教派。所谓“弥勒教”，按百度百科词条云：弥勒教最早于梁武帝时期创立，创始人傅大士，其后数百年间，不断吸收佛教、道教、摩尼教诸教部分思想，最后形成白莲教。这是一个笼统而无意义的解释，傅大士是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关键人物，颇多创见，不限于解释弥勒；佛经中早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但说傅大士创建弥勒教则毫无依据；有些人还把北魏法庆之乱、北宋王则之乱直至元末红巾军起义指为弥勒教发展的线索，更是附会之言——把历史上弥勒信仰的一些现象想象成一个实体性的“弥勒教”了。

除了元末起义，马西沙还否定了明清时期诸多重大民间宗教教派的起义是白莲教起义。如明末徐鸿儒起义是闻香教起义，清中期川楚等五省农民起义是混元教和收元教起义，嘉庆十八年起义是八卦教起义。^②这种以个案实证来推翻笼统而模糊不清的成见具有积极意义，但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他没有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白莲教无时不在的现象。

故而，马西沙的观点对于辨明传统所说的白莲教、他本人使用的香会或香军、如何区别明清民间教派是有帮助作用的，但他没有说明

①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8—159页。

② 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前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白莲教”起义与案件，即使是在明中期至清代依然如故。

三、田海的白莲教否定论

1. “白莲教”的概念史研究

1992年，当时任教于莱顿大学的田海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一书。与中国学者研究断代或专题之类的视角相比，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将以往零碎的有关白莲教概念的辨析集中起来，将白莲教的语义分析置于从两宋至清末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之中，对白莲教进行了概念史的重构。^①他借鉴西方学界有关种族歧视研究所使用的“标签”(label)与“成见”(stereotype)这两个术语，指出宋元时期存在“白莲传统”及“白莲运动”，这一传统原本具有积极意义并被作为“本名”使用，后来逐渐变为模式化的邪教与叛乱意义的标签——“白莲教”。所谓“白莲教”是官方与文人逐步建构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假名”。另一方面，宋元时期的白莲运动被继承下来。无为教继承了“旧式的非精英大众层面的白莲运动”，“明末僧人株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达观)所领导的精英民间佛教运动，则继承了文人学士层面的白莲社”。^②而“民间佛教徒使用道人或道民的名号，领导或发动公共福利建设(比如建桥)”^③则是第三类继承，即比较分散的继承。

① 田海的研究代表了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史学研究开始关注一些重要概念的语义变迁，逐渐形成概念史，近年也开始被人介绍到国内。

② Barend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218.

③ Barend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219.